

## 梁元帝《职贡图》与“西戎”诸国\*

霍 巍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和国内不同古代民族之间关系复杂而多元的历史阶段。从近年来有关梁元帝《职贡图》摹本的新发现,以及青海吐谷浑故地南北朝至唐代吐蕃时期的考古新成果综合分析,可以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在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之下,南朝与西域各国的交流不仅并未中断,反而通过与川西北高原、甘青一带“西戎”各古代民族之间积极的交往、互动,建立起以长江上游益州、中游荆州为重镇的丝路交通网络,体现出南朝中央的“大一统”国家观和民族观,维系了秦汉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及“朝贡制度”的延续,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梁元帝 《职贡图》 青海道 西域研究 朝贡制度

作者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地址:成都市,邮编 610064。

梁元帝《职贡图》旧传有三种版本,一为传唐人阎立本摹本《唐阎立本王会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二为传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本《梁元帝蕃客入朝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为传北宋熙宁十年(1077)前摹本《唐阎立德职贡图》(旧藏南京博物院,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三种版本的《职贡图》中外学术界都曾高度关注,并多有研究论著发表。<sup>①</sup>近年来,赵灿鹏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又新发现了有关梁元帝《职贡图》的第四种版本,即葛嗣滂(1867—1935)记录的张庚(1685—1760)乾隆四年(1739)摹本《诸番职贡图卷》(收入葛嗣滂《爱日吟庐书画续录》卷5),并首次公布了相关研究成果。基于新发现的资料,又陆续有学者发表了相关论著。<sup>②</sup>

\* 本文系四川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学术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四川新出南朝造像的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8ZDA2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既往研究举其要者有: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读画札记》,《文物》1960年第7期;徐邦达:《阎立德、阎立本:职贡图即王会图卷》,《古书画伪讹考辩》,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钱伯泉:《〈职贡图〉与南北朝时期的西域》,《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榎一雄:《職貢図の起源》,《東方學會創立四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方學會,1987年;榎一雄:《梁職貢図について》,《東方學》第26輯,1963年,此文又载于榎一雄著作編集委員会編:《榎一雄著作集》卷七,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余太山:《〈梁書·西北諸戎傳〉與〈梁職貢圖〉》,《燕京學報》新5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的新发现》,《文史》2011年第1辑;《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续拾》,《文史》2011年第4辑。王素:《梁元帝〈职贡图〉与西域诸国——从新出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引出的话题》,《文物》2020年第2期;《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图像与题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四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72—78页。罗丰:《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文物》2020年第2期。米婷婷:《梁元帝〈职贡图〉“女蛮”即“临江蛮”考》,《文物》2020年第2期;《梁元帝〈职贡图〉的形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四十一辑,第79—93页。吕博:《〈梁四公记〉与梁武帝时代的文化交流图景》,《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

综观前人研究,涉及面极为广泛,有的讨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有的考辨各种不同版本《职贡图》的真伪及其源流、传承与演变;也有的讨论梁元帝《职贡图》与《梁书·诸夷传》在文献史料、史源上的关系;还有讨论梁元帝《职贡图》中的国家排序方式及其所反映的“世界秩序”,涉及美术史、民族史、政治史、考古学、中西交通等诸多领域,充分反映出梁元帝《职贡图》所包含的重要历史信息及其对于认识理解南朝与周边国家、古代民族关系的多方面历史价值。虽然不同时代的摹本往往会把自己所处时代的审美和历史认知在摹本中加以表现,不同时代的摹本实际上也曲折地反映出不同时代的边疆观与民族观,但通过对不同摹本之间的参互比较,不难发现其中一些使者的具体族名、国名在梁元帝时代的初始出现状态与类型。他们最初的排序方式因时代变迁、摹写者的取舍、后世拼接造成的版本不同等多种因素,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但透过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梁元帝时代对于周边国家和古代民族关系的基本认知,并探讨和追溯南朝梁代重整内部治理,调整对外交往重心,试图建立新型“华夷”关系这一国策的一些基本构想。

具体而论,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针对近年来梁元帝《职贡图》研究中一个过去较少为人关注的问题,即图中所涉“西戎”诸国的划分,及这些古代民族对于南朝经营长江上游、扼控重镇益州,并经“青海道”保持西域丝路畅通的重大历史作用,再作进一步的讨论,更深层次地探索南朝“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考察南朝在秦汉统一王朝之后对于“世界秩序”与“朝贡制度”理念的维系和运作。

## 一、梁元帝《职贡图》对于“天下”与“国家”的认识

先后发现的四种不同版本的《职贡图》摹本,其中成画年代最早者据金维诺先生考证,应是南京博物院所藏相传为唐代画家阎立德或阎立本所绘的《职贡图》,从作品的风格和技巧上看,显然不是初唐的作品,年代要早于初唐,“可能是南北朝晚期的绘画”。<sup>①</sup>其他几种《职贡图》摹本之间的亲缘关系及其源流演变前人已经作过较多研究,<sup>②</sup>尤其是残存的题记,可能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递增,<sup>③</sup>原画实际的题记存佚及文字内容已无从知晓。不过,通过观察各个版本中具体的使节名号,可以比对出其中可以基本确认为原图中所见的国名与古代族名。

传唐人阎立本摹本《唐阎立本王会图》,内容为“鲁国”等二十四国使者着色画像,每段以楷书注明国名,依次为虜国、芮芮国、波斯国、百济国、胡密国、白题国、靺国、中天竺、狮子国、北天竺、羯盘陀、武兴国、龟兹国、倭国、高丽国、于阗国、新罗国、宕昌国、狼牙修、邓至国、周古柯、阿跋檀、建平蛮、女蛮国。

传为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本《梁元帝蕃客入朝图》内容为“鲁国”等三十三国使者白描画像,据研究原图“共三十五段,其中重复二国,失题名两国”,<sup>④</sup>故现存依次为鲁国、芮芮国、河南、中天竺、为国、林邑国、狮子国、北天竺、羯盘陀国、武兴国、宕昌国、狼牙修国、邓至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国、倭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密丹国、白题国、临江蛮、高丽国、高昌国、天门蛮、

① 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读画札记》,《文物》1960年第7期。

② 余太山:《〈梁书·西北诸戎传〉与〈梁职贡图〉》,《燕京学报》新5期,第93—123页。

③ 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文物》1992年第2期;米婷婷:《梁元帝〈职贡图〉的形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四十一辑,第79—93页。

④ 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的新发现》,《文史》2011年第1辑。

建平蛮、滑国、于阗、新罗、干陀国、扶南国。

北宋熙宁十年前摹本《唐阎立德职贡图》，内容有滑、波斯、百济、龟兹、倭、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末国等十二国使者着色画像，共分为八段，每段以楷书注明其为某国使，并有关于此国历史地理风俗题记十三则（其中宕昌国使缺画像）。

新发现的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有十八国题记，分别为滑、波斯、百济、龟兹、倭、高句丽、于阗、斯罗、宕昌、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檀、白题、渴盘陀、武兴番、高昌、天门蛮。<sup>①</sup>

综合比较上述现存四种与梁元帝《职贡图》关系密切的摹本，其中出现的诸国、族使节画像和题记原来的排序方式，因纸本剪裁、衔接、残留、传抄等历史上复杂的情况，已经难以复原，但梁元帝《职贡图》初始状态下的国名和族名可以从正史提供的线索中有所认识。例如，据金维诺先生考订，《梁书·诸夷传》和梁元帝《职贡图》中所载的“西戎”诸国，在《隋书》《唐书·西域传》中多已不见记载，或改用他名，或为外国所灭。其中滑国在南梁以后称为“嚧哒”，仅在《梁书·诸夷传》中称为滑国。另如，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密丹国都是滑国旁的小国，金维诺先生推测它们可能是在突厥灭滑国时一并被破灭。<sup>②</sup>又如，宕昌、邓至在北周时已先后灭亡，不再有传记见于史载。从这些方面来看，可以断定《职贡图》最初的“祖本”应是南梁时代绘成。如果基于这样一个讨论问题的前提，即认同这些后世形成的版本均为根据梁元帝《职贡图》的原本（“祖本”）逐渐衍生而成，其中主要的国名和族名仍然保持了原图的初始状态，仅仅是在接续、排列等方面存在差异，那么依据后人对梁元帝《职贡图》的摹本，也仍然可以从中大致了解到南朝梁代对于“天下”与周边“国家”框架的基本认识。

从地理方位而论，南朝对于四方各国均有涉及。首先，对于北方中原的北魏，被南梁视为最大的敌国，故在传世《职贡图》题记中常以“鲁”或“虏”称之。《梁元帝蕃客入朝图》中有“为国”的题记，较为罕见。罗丰先生研究认为，“‘为国’的装束同汉式，或为‘伪国’或西魏国，南朝称北魏为‘伪’。‘为’‘伪’‘魏’的中古音十分接近，差别细微”，<sup>③</sup>这是很有可能的。其次，又可分出海南、东夷、西域诸国。海南诸国如林邑、扶南、狮子国、狼牙修、中天竺、干陀国等；东夷诸国则有倭、百济国、高句丽、新罗等国；西域诸国出现的频率最高，王素先生认为其在国博藏传宋摹本《唐阎立德职贡图》和《诸番职贡图卷》这两个版本当中，西域诸国都“占绝大多数”。<sup>④</sup>但实际上“西域诸国”还可从中再做细分，这将在下文中详论。

可以窥见，梁元帝《职贡图》所描绘的“天下”与“国家”的图景，基本沿袭了自汉代司马迁《史记》以来正史的叙事结构，即以南梁自视为文化正统的“中国”为中心来区分“内”与“外”，中国的周边东西南北分布着“四夷”，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方”，尽管我们目前已经无法知晓原图的记录次序和排位先后顺次，即究竟梁元帝《职贡图》原图是按照四夷所在的地望距离“中国”的远近来排序？还是按照这些周边国家和古代民族与南梁政治关系的亲疏，或者依其国力强弱，甚至与南梁国家利益关系大小等因素来排序？<sup>⑤</sup>但从总体上看，仍然体现出“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天下”与“国家”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种“世界秩序”，即将“中

① 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的新发现》，《文史》2011年第1辑。

② 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读画札记》，《文物》1960年第7期。

③ 罗丰：《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文物》2020年第2期。

④ 王素：《梁元帝〈职贡图〉与西域诸国——从新出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引出的话题》，《文物》2020年第2期。

⑤ 已有学者对此做过颇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探索，如罗丰：《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文物》2020年第2期。

国”(内)之“外”的国家和“蛮夷”诸族均按照方位划入“四夷”的大框架之中,并通过《职贡图》这种特殊的方式,力图反映“中国”与“四夷”之间形成的朝贡体系。

不过,也有一些变化。在梁元帝《职贡图》当中,出现了“国”和“蛮”“番”的不同称谓,笔者认为,这是后来宋元之际以“外国传”专门记录域外历史、事迹而与传统的“四夷传”相区别这一书写方式转换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只是在《职贡图》中还尚未形成严格“外国”和“四夷”的区分。如“建平蛮”“天门蛮”等长江中游荆楚一带的古代民族被称为“蛮”;而本属同一区域、同一性质的古代民族“女蛮”则在有的版本中被称为“女蛮国”。已有学者研究认为,“女蛮国”实际上很可能即为“临江蛮”。<sup>①</sup>又如“武兴国”,在不同的版本中也有称为“武兴番”者,两者之间的界定何为“国”、何为“蛮”也并不十分清晰。《南齐书·蛮传》称:“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sup>②</sup>其中荆州是诸蛮聚集之地,梁元帝《职贡图》中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平蛮、天门蛮、临江蛮(女蛮蛮)等均列入与四夷诸国同等意义上的“朝贡体系”之中,甚至有的冠之以“国”,恰恰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诸蛮”在自视为“中国正统”的南梁统治者心目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sup>③</sup>

上述各个版本当中,“西域诸国”最为众多。如《唐阎立本王会图》中出现的芮芮国、波斯国、胡密国、白题国、靺国、北天竺、谒盘陀、龟兹国、于阗国、宕昌国、邓至国、周古柯、阿跋檀等;《梁元帝蕃客入朝图》中出现的芮芮国、河南、谒盘陀国、武兴国、宕昌国、邓至国、波斯国、龟兹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密丹国、白题国、高昌国、滑国、于阗等;国博藏传宋摹本《唐阎立德职贡图》中出现的滑、波斯、龟兹、宕昌国、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等;《诸番职贡图卷》出现的滑、波斯、龟兹、于阗、宕昌、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檀、白题、谒盘陀、武兴番等,均被既往研究者列入“西域诸国”的范围之内。然而事实上,笔者认为其中一些如“河南”“武兴”“宕昌”“邓至”等,实际上从地理位置上看并非处在传统意义上的西域,而只是长江上游川西北高原和甘青地区的古代民族。从方位上看,将其划入“西北诸戎”(本文简称为“西戎”)大体尚可,但如果将其划入“西域诸国”当中,与芮芮(柔然)、波斯、龟兹、于阗、高昌这类西域大国相提并论,很显然并不对等。所以,《梁书·诸夷传》中将周边诸夷划分海南、东夷、西北诸戎三大类别,其中“西北诸戎”既包括有西域诸国,也包含有其他一些地处南朝西北、西南的古代民族,这和梁元帝《职贡图》显示出的情形相似。这个变化,说明和上文所论南方“诸蛮”在《职贡图》当中的列位变化一样,长江上游川西北高原、甘青地区的部分“西戎”族群,在南梁时代地位上升,被视为具有和西域诸国同等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梁元帝《职贡图》所反映出的“天下观”和“国家观”与秦汉以来史家所创设的周边叙事传统仍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即以“中国”为中心,将无论是域内还是域外的“外国”“蛮夷”都分别列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方”之中,而无论其是否来自同一族属、政治上是否有所关联。尽管事实上在梁元帝《职贡图》的题记和《梁书·诸夷传》中经常标注出“大国”

① 米婷婷:《梁元帝〈职贡图〉“女蛮”即“临江蛮”考》,《文物》2020年第2期。

② 《南齐书》卷58《蛮》,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07页。

③ 有学者认为:“至于临江蛮、天门蛮、建平蛮(蛮)均属荆州蛮,齐梁以来已逐渐归化,所以收入《职贡图》,只是因为梁元帝曾两次出使荆州刺史,可以显示自己管理有方。”参见王素:《梁元帝〈职贡图〉与西域诸国——从新出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引出的话题》,《文物》2020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梁朝时,荆州治下诸蛮已向荆州贡献方物,遂成为萧绎统治的重要贡献”。参见罗丰:《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文物》2020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与本文所论南梁对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的经略及其与西域通道的管控更有着直接的关系。

“小国”“旁国”等称谓,但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在于,对于南方长江中游一带的荆楚“诸蛮”和长江上游、甘青地区的部分“西戎”,梁代统治者均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列位上使其处于和四方诸国相提并论的地位。这个变化背后的历史原因,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 二、处在西域与益州之间的“西戎”诸国

如上所论,上述被梁元帝《职贡图》特别关注的位于长江上游川西北高原、甘青地区的部分“西戎”,有些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西域诸国,但都是位于扼控南朝与西域之间交通咽喉之所的重要邦国,从地理位置上看,恰恰都处于西域和益州(成都)之间,这与南朝地缘政治、地域交通及其对长江上游、甘青区域的经营,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梁书·诸夷传·西北诸戎》开宗明义记载:“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阙庭者,则仇池、宕昌、高昌、邓至、河南、龟兹、于阗、滑诸国焉。”<sup>①</sup>表明这些“西北诸戎”与南梁已经建立起了朝贡关系。需要尤其关注的是,在《梁书·诸夷传》所列举的“西北诸戎”当中,和梁元帝《职贡图》一样,可以明显区分出不同于传统西域诸国的几个主要邦国,即宕昌、邓至、河南、武兴(仇池)诸国。下面,我们参照《梁书·诸夷传》与《职贡图》,分述如下:

### 1. 宕昌国

《梁书·诸夷传》记载:“宕昌国,在河南之东南,益州之西北,陇西之西,羌种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瓘忽始献方物。天监四年,王梁弥博来献甘草、当归,诏以为使持节、都督河梁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弥博死,子弥泰立,大同七年,复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风俗与河南略同。”<sup>②</sup>在《职贡图》摹本中,宕昌国有的残存有人物图像,有的残存有题记。余太山先生曾据裴子野《方国使图》的残存题记比定梁元帝《职贡图》宕昌国题记:“(前文缺)贡方,[物]齐永明中[有](以下缺文)监十年,梁弥博表献甘草当归,诏为□□□□□□(使持节都督河凉)二州安西军护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衣物风俗与河南国略同。”<sup>③</sup>新发现的《诸番职贡图卷》宕昌国题记前部残缺,“监十年”上,可补以下六十字:“宕昌国,在河南虏东南,益州之西北,陇西之地。其王曰梁氏。宋孝武世,有宕昌王梁谨忽始贡方物。齐永明中,宕昌王梁弥机,机死,弥颜立,并受中国爵号。天。”<sup>④</sup>题记中除宕昌王的姓名与《梁书·诸夷传》略有出入之外,史实大体相同。

《梁书·诸夷传》中记载宕昌国“在河南之东南,益州之西北,陇西之西”,显示出宕昌与吐谷浑、益州、陇西之间相互毗邻的特殊地理位置。另在《魏书·宕昌传》中记载:“宕昌羌者……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既其一也。”<sup>⑤</sup>据周伟洲先生考证,宕昌是羌族梁氏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其地望大至在今甘肃东南白龙江上游,中心即在今甘肃宕昌附近。宕昌与北魏关系密切,吐谷浑在其西北,故受吐谷浑的影响很深,也受吐谷浑的挟制。北魏太和九年(485)宕昌王弥机死,其子弥博立,吐谷浑曾经发兵攻宕昌,弥博逃奔仇池,北魏仇池镇将穆亮率兵击吐谷浑,并立弥机兄子弥承为宕昌王。此后,

① 《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09页。

② 《梁书》卷54《诸夷传》,第815页。

③ 题记转引自余太山:《〈梁书·西北诸戎传〉与〈梁职贡图〉》,《燕京学报》新5期,第118页。笔者另加了标点。

④ 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的新发现》,《文史》2011年第1辑。

⑤ 《魏书》卷101《宕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41—2242页。

宕昌与北魏关系更为密切，“朝贡相继”。至北魏永熙三年(534)之后，北魏衰亡，宕昌又背北魏而完全依附于吐谷浑。直到北周保定四年(564)大将军田弘击灭宕昌，以其地置宕州，宕昌羌内一部分散入党项，一部分入吐谷浑。<sup>①</sup>正是因为宕昌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故南北朝时期也成为北魏和南朝争夺的要地。《梁书·诸夷传》记载刘宋时宕昌王梁瓘忽“始献方物”，梁武帝天监年间，宕昌王梁弥博又向南梁“献甘草、当归”，并获得南朝的诏封，反映出南北政权之间对宕昌的争夺十分激烈，宕昌也同时向北朝和南朝示好，从中获利。

## 2. 邓至国

《梁书·诸夷传》记载：“邓至国，居西凉州界，羌别种也。世号持节、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宋文帝时，王象屈耽遣使献马。天监元年，诏以邓至王象舒彭为督西凉州诸军事，号安北将军。五年，舒彭遣使献黄耆四百斤，马四匹。其俗呼帽为突何，其衣服与宕昌同。”<sup>②</sup>邓至国在《职贡图》中也残存题记：“邓至国使。邓至国西凉州界[羌]别种也，宋文帝世，邓至王象屈耽遣其所置[里]水镇将象破羌上书献骏马，天监五年国王象舒彭遣属僧崇献黄耆四百斤、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阿，其衣服与宕昌略同。”<sup>③</sup>另据《魏书·邓至传》记载：“邓至者，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其地自街亭以东，平西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sup>④</sup>从上述史料可知，邓至位于宕昌以南，也为羌人建立的小政权。白水羌，是指今甘肃、四川交界之处的白水江一带的羌人别种，周伟洲先生考证邓至的中心大致在今四川南坪一带，<sup>⑤</sup>应当可信。邓至与宕昌风俗相近，地理位置相邻，也是处在西域与益州交界的关隘之地。从南朝刘宋开始，便已经向南朝纳贡，所献之土产为本地所生的良马。南梁时再度遣使来朝，所进贡之方物也不过是“黄耆四百斤，马四匹”，却充分表达了和南朝之间朝贡关系的建立。所以，在梁元帝《职贡图》中，将与宕昌相邻的小国邓至来使也正式载入史册，体现出南梁对川西北高原一带的诸小国也同样高度重视。

## 3. 武兴国

武兴国使节多次出现在《职贡图》中。据《梁书·诸夷传》记载：“武兴国，本仇池。……其国东连秦岭，西接宕昌，去宕昌八百里，南去汉中四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东去长安九百里。本有十万户，世世分减。其大姓有苻氏、羌氏。言语与中国同。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鞞。地植九谷。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sup>⑥</sup>新发现的《诸番职贡图卷》题记中，即有“武兴番”，可与《梁书·诸夷传》中的“武兴国”相互对照：“武兴番本是仇池国，国王姓杨。其国东连秦岭，西接宕昌，南接梁汉，北接岐州。去长安九百里。国有十万户，世世分减，今已半矣。言语与中国略同。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靴。种五谷。婚姻备六礼，知诗书。智慧大同元年，遣使符道安、杨琬等送启，乞归其国。”<sup>⑦</sup>《诸番职贡图卷》题记中“智慧大同元年，遣使符道安、杨琬等送启，乞归其国”一句，在《梁书·诸夷传》中载为：“大同元年，克复

① 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3页。

② 《梁书》卷54《诸夷传》，第815—816页。

③ 题记转引自余太山：《〈梁书·西北诸戎传〉与〈梁职贡图〉》，《燕京学报》新5期，第119页。笔者另加了标点。

④ 《魏书》卷101《邓至》，第2245页。

⑤ 周伟洲：《吐谷浑史》，第63页。

⑥ 《梁书》卷54《武兴》，第816—817页。

⑦ 转引自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的新发现》，《文史》2011年第1辑。

汉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户归国,诏许焉,即以爲东益州。”<sup>①</sup>两者相互对照,不仅可得知梁武帝大同元年(535),武兴国新立国君智慧请求率部众四千归国,获南朝诏准,而且还新发现使节符道安、杨瓌之名,似为传世史书所不见。

#### 4. 河南国

河南国即吐谷浑国,是西域与益州之间最为重要的地方政权。《梁书·诸夷传》载: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流沙地焉。……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女子披发为辫。其后吐谷浑叶延,颇识书记,自谓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吾盖公孙之子也。礼以王父子为国氏,因姓吐谷浑,亦为国号。至其末孙阿豺,始受中国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号河南王。慕延死,从弟拾寅立,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国中有佛法……梁兴,进代为征西将军,代死,子伏连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进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临,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sup>②</sup>

《梁元帝蕃客入朝图》中使节人物画像中,第一段出现的就是鲁国三人、高昌国一人、河南国一人,位次均居于前列。如同罗丰所言,“这样的排序也许并不能完全反映萧绎《职贡图》的原始状况,但其所隐藏的含义或可得到某种程度的呈现。南朝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关系,是国家排序的主要指导原则”。<sup>③</sup>在南朝与河南国(吐谷浑)的关系中,后者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吐谷浑处在西域与益州之间,“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掌控着南朝与西域交通的要冲之地。所以,南朝要经略西域交通线路,保证与西域各国之间来往畅通,首要必须保持与吐谷浑之间的友好往来。根据《梁书·诸夷传》所载,吐谷浑使节在梁代“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与南梁的交往在“西戎”诸国中也是十分密切的。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益州是南朝在长江上游的重镇,尤其是梁武帝即位之后,对于益州的经营成为南朝的重大国策之一,多派遣皇族亲信出任益州刺史。而吐谷浑因为“其地与益州临,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所以和南朝之间在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着更多的联系。《梁书·诸夷传》记载,吐谷浑“国中有佛法”,崇信佛教,而梁武帝颇热衷佛教,所以在天监十三年(514)吐谷浑提出要在益州“立九重佛寺”,也得到梁武帝的诏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成都及其附近地区考古发现大量南朝佛教造像,<sup>④</sup>其中年代最早的为齐

① 《梁书》卷54《武兴》,第816页。

② 《梁书》卷54《诸夷传》,第810—811页。

③ 罗丰:《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文物》2020年第2期。

④ 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南朝造像研究,主要可参见冯汉骥:《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四川省文管会:《成都万佛寺继续发现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刘志远、刘迁璧:《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袁曙光:《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南朝石刻造像》,《四川文物》1991年第3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张肖马、雷玉华:《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年第10期;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0期;霍巍:《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两尊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年第10期;彭州市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彭州龙兴寺出土石造像》,《文物》2003年第9期;袁曙光:《四川茂县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霍巍、罗进勇:《岷江上游新出土南朝石刻造像及相关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孙华:《四川绵阳平阳县君阙阙身造像》,《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中华书局2013年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下同仁路遗址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坑》,《考古》2016年第6期。

永明元年(483)造像,主尊佛衣式样为汉地“褒衣博带”式袈裟且在胸前系带打结,这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实例。从齐永明造像的发现地点来看,它正好处在四川通向甘肃、青海等地的交通线路之上的岷江上游,其背后可能暗含着与甘青一带佛教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从造像题铭中有“西凉曹比丘释玄嵩”的名号来看,也可佐证造像者与西域凉州一带的关系密切。因此,国外学者甚至提出在南朝益州与吐谷浑之间,存在着一条西通西域各国、东接南朝首都建康的佛教传播路线——“吐谷浑道”。<sup>①</sup>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朝和吐谷浑之间关系上的重要性。

综合以上对梁元帝《职贡图》和《梁史·诸夷传》中专门列出的部分“西戎”诸国的观察,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些显著的特点:其一,这些邦国从地理位置上看,都位于今川西北高原、甘青地区一带,它们既和真正意义上的西域各国有所联系,但又不完全与西域诸国相等同,以往的研究者笼统地将其一并划归到西域诸国的认识,似有加以调整的的必要。其二,观察上述所举宕昌、邓至、河南、武兴(仇池)诸国,它们均处在西域和长江上游重镇益州之间,分别以河南国(吐谷浑)和益州为其首尾两端,《职贡图》和《梁史·诸夷传》的叙事,也多以河南国、益州作为标定其地理方位的参考坐标。其三,梁元帝《职贡图》和《梁史·诸夷传》对于这些“西戎”邦国的列位,似乎并不依其国之大小、强弱为序,而是高度关注其地理位置的重要程度,凡与益州、河南(吐谷浑)相互毗邻者无论大小均一一列举,从南至北分列为武兴、宕昌、邓至、河南(吐谷浑)一线。

《职贡图》所表现出的这样一个叙事特点,似乎还并不仅仅限于上述“西戎”诸国,即使是在距离南朝更为遥远的西域各国,也常常还会以益州、岷山道等作为地理坐标来加以强调。如梁元帝《职贡图》上出现的滑国、白题等,均与南梁王朝有过朝贡关系。据与《职贡图》关系十分密切的《梁书·裴子野传》记载:“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敕仍使撰《方国使图》,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sup>②</sup>这段记载中,梁代裴子野所言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处在西北徼外的白题及滑国,在南梁时曾遣使朝贡,而且强调其所利用的是“岷山道”。新发现的《诸番职贡图卷》中的高昌国题记,也有两处提到益州:“高昌国,去益州一万二千里。国人言语与魏略全……寒暑与益州相似。”王素先生认为,如此强调益州,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时西域与南朝交通,由于河西走廊被北朝控制,都走避开河西走廊的传统的汉魏羌中路或西羌路,也就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路或吐谷浑路,然后进入益州顺长江东下到建康”,<sup>③</sup>可谓中的之语。

### 三、“西戎”诸国在南朝对长江上游和西域交通经营上的意义

通过上文的分析,从更深的层面上探索,笔者认为梁元帝《职贡图》的本体意识当中,很可能还暗含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在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之下,萧梁王朝仍然力图维持南朝与西域各国的交流不因南北隔阻而中断,尤其企望通过与川西北高原、甘青一带“西戎”各古代民族

① 山名伸生:《吐谷浑と成都の佛教》,《佛教藝術》第218號。

② 《梁书》卷30《裴子野传》,第443页。

③ 王素:《梁元帝〈职贡图〉与西域诸国——从新出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引出的话题》,《文物》2020年第2期。

之间的交流、交往与互动,建立起以长江上游益州、中游荆州为重镇的丝路交通网络,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充分体现南朝中央的“大一统”国家观和民族观,努力维系秦汉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及“朝贡制度”的延续。

在传世文献中所保存下来的梁元帝《职贡图》序文当中,这个意图是很明显的:

梁元帝职贡图序曰:窃闻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四夷八蛮,七闽九貉,其所由来久矣,汉氏以来,南羌旅距,西域凭陵,创金城,开玉关,绝夜郎,讨日逐,睹犀申则建朱崖,闻蒲陶则通大宛,以德怀远,异乎是哉,皇帝君临天下之四十载,垂衣裳而赖兆民,坐岩廊而彰万国,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云望日,重译至焉。……尼丘乃圣,犹有图人之法。晋帝君临,寔闻乐贤之象,甘泉写闾氏之形,后宫玩单于之图。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沂荆门,瞻其容貌,诉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采访,以广闻见,名为《职贡图》云尔。<sup>①</sup>

萧绎在文中首先追溯了自汉氏以来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记载“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以及域外诸国情形的历史传统,继而回顾了梁武帝君临天下四十载,万邦来朝的盛况,其后,尤其表达了萧绎本人对长江上游一带的高度关切。所谓“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正是对长江上游地区既有各方“诸夷”,又有来自远方“胡人”这一现实状况的写照;而从上游再顺江而下“沿沂荆门”,则是通过中游荆楚之地四方“来朝京辇”的必经之途。萧绎“瞻其容貌,诉其风俗”,绘制成《职贡图》,究其初衷,南朝,尤其是梁武帝以来高度关注长江上游“诸戎”以及益州、西域一带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策略,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南朝长江上游的重镇,非益州(成都)莫属,其地位如《南齐书·州郡志》所载:“益州,镇成都……三峡险阻,蛮夷孔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sup>②</sup>《南齐书·芮芮虏》中也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sup>③</sup>从南北朝时期总体地缘政治而论,益州是南朝和北朝相互争夺的长江上游战略要地,梁武帝以来,对于益州的经营极其重视。日本学者曾注意到,梁代益州刺史除首任刺史邓元起(502—504年在任)之外,继任的西昌侯萧渊藻(504—510年在任)、始兴王萧憺(510—514年在任)、鄱阳王萧恢(514—518年在任)、西昌侯萧渊藻(518—520再任二年)、晋安王萧纲(520、未就任)、临汝侯萧渊猷(521—526年在任)、鄱阳王萧范(526—537年在任)、武陵王萧纪(537—553年在任)等人,均为梁武帝的“皇亲国戚”,由此可知梁代对蜀地经略的重视程度。<sup>④</sup>究其原因,不只是因为蜀是与西域各国交通之间重要的枢纽,也和来自北魏、西魏等北方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强有关。由于北方强敌控制了陆上通道,因此从梁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康通往长江上游,主要必须依靠长江水路。在旧金石学材料当中,还可以找到第四任益州刺史鄱阳王萧恢率军通过长江天险三峡时留下的题铭:“天监十三年十二月,鄱阳王任益州军府,五万人从此过,故记之。”<sup>⑤</sup>可见梁代利用长江水道向蜀地输送军事力量的历史遗迹。作为南朝对手的北魏,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如《魏书·邢峦传》

① 《艺文类聚》卷55《杂文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9—1510页。

② 《南齐书》卷15《州郡下》,第298页。

③ 《南齐书》列传第四十《芮芮虏》,第1025页。

④ 諏訪義純:《梁武帝の蜀地經略と佛教——益州刺史の任史を中心として》,《中國南朝佛教史研究》,京都:法藏館,1997年;吉村怜:《成都萬佛寺出土の佛像と建康佛教》,原載《佛教藝術》240號,1998年,后收入其论文集《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⑤ 《八琼室金石补证》卷11,日本学者吉村怜首先注意并引用到这条史料,参见吉村怜:《成都萬佛寺出土の佛像と建康佛教》,原載《佛教藝術》240號,1998年,后收入其论文集《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

中就记载：“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唯资水路。”<sup>①</sup>也是将上游的重镇益州列入必争之军事要地来看待的。

以益州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建立西通西域各国、南下建康的交通网路，对于南梁也具有战略性意义，来自各地的商贾往来于吴蜀之间，可以利用长江水道获取巨大的财富。而往来于西域、益州、荆州、建康之间的佛教僧人，往往也和这些商队如影随行，不绝于史载。一些来自西域的僧人，先在凉州传法，尔后南下益州，然后才辗转去往荆州和建康，益州成为其重要的驻锡地和中转站。

如昙摩蜜多，“罽宾人也……少好游方，誓志宣化，周历诸国，遂至龟兹……遂度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事，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以宋元嘉元年展转至蜀，俄而出峡，止荆州，于长沙寺造立禅阁，翹诚恳恻，祈请舍利”。<sup>②</sup>

释僧隐，“姓李，泰州陇西人，家世正信，隐年八岁出家，使能长斋，至十二岁蔬食及受具戒，执操弥坚。……闻西凉州有玄高法师禅慧兼举，乃负芟从之，于是学尽禅门，深解律要，高公化后，复西游巴蜀，专任弘通。顷之东下，止江陵琵琶寺”。<sup>③</sup>

曷良耶舍，“此云时称，西域人……初止于钟山道林精舍……元嘉十九年西游岷蜀，处处弘道，禅学成群，后还卒于江陵”。<sup>④</sup>

释超辩，“姓张，敦煌人。幼而神悟孤发，履操深沈。诵《法华》、《金刚波若》。闻京师盛于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达于建业。顷之东适吴越，观瞩山水……，后还都，止定林上寺，闲居养素，毕命山门。……以齐永明十年终于山寺……时有灵根释法明、祇洹释僧志、益州释法定，并诵经十万余言，蔬苦有至德”。<sup>⑤</sup>

从益州再向西行，横亘在西域和益州之间的，就恰恰是上文所论的“西戎”诸国宕昌、邓至、河南等国。如同严耕望先生所论：“按当时南北分裂，益州西北逾岷岭高原而至河湟、河西之交通路线大通，故河西、凉州、西域之僧徒多有取道岷岭入蜀，或经蜀中东下江陵、建康者。”<sup>⑥</sup>又说，“河南入蜀之道，有明云取途岷山者；有云宕昌、龙涸者。龙涸，地在松潘草原，宕昌亦岷山松潘草原之东境。是此一地区，当南朝益州与河、湟、西域、漠北之重要要际交通路线，且交通往还相当频繁也”。<sup>⑦</sup>王素先生也注意到：“当时，即使如高昌国，由于种种原因，遣使到建康，走的还是河西走廊故道，但中途仍是绕经宕昌进入益州，然后由益州经荆州到建康的。”<sup>⑧</sup>宕昌在唐宋时期的地理志中也记为宕州，也有称为宕昌寨、宕昌驿、宕昌镇者。<sup>⑨</sup>严耕望先生考订认

① 《魏书》卷 65《邢峦》，第 1440 页。

② （梁）慧皎撰：《高僧传》卷 3，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0、121 页。

③ （梁）慧皎撰：《高僧传》卷 11，第 80 页。

④ （梁）慧皎撰：《高僧传》卷 3，第 128 页。

⑤ （梁）慧皎撰：《高僧传》卷 12，第 471 页。

⑥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2 页。

⑦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 928 页。

⑧ 王素、李方：《〈梁四公记〉所载高昌经济地理资料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

⑨ 严耕望先生据《大元一统志》巩昌府卷·古迹目·宕昌故国条考订：“唐之交和戍，宋之宕昌寨，又引《明统志》云：‘宕州城在岷州卫南一百二十里，宋时运蜀茶市马于岷。及金人据洮州，遂置蕃市于此，岁市马数千，因置宕昌驿，为纲马歇息之所。’按宕昌虽非宕州所在，然为宕昌国故城，即唐交和戍，宋世此道为茶马贸易要道，则殊可信。”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 952 页。

为：“宕州为宕昌旧国中心地带，当为此一地区经济条件较优地区，尤当为此一地区之交通中心。松州向北交通，观宕州位置当为所经之地……宕昌国故城，盖今宕昌镇，转西北，循今白龙江支流之岷江而上，中经恭县、逾岭，又循另一水而下岷州（今岷县）。道中山水绝秀，自南北朝以来，此道即为西北诸国及高胡通南朝之径途。下迄宋、金，茶马贸易仍循此道。”<sup>①</sup>由此，或可探知梁元帝《职贡图》中将宕昌、邓至这些“西戎”小国也慎重其事地加以记载的深层原因。

前已论及，在“西戎”诸国当中，最为重要的是河南（吐谷浑）。从吐谷浑所处地理位置而论，不仅扼控南北交通，是南朝从益州通向西域的最大关隘，西域诸国中的高昌、于阗，漠北草原的芮芮（柔然）、丁零和吐谷浑一道欲与南朝联手共同抗拒北朝强敌，也往往通过吐谷浑作为中介，从而使得吐谷浑能够左右逢源、多方获利，严耕望先生评价其地位说：“吐谷浑河南国成为西通西域，北通柔然，东通北朝，南通南朝之交通中心。”<sup>②</sup>的确是恰当的。近年来，在青海吐谷浑故地考古中又有不少的新发现，如青海都兰热水2018年一号大墓、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sup>③</sup>墓葬的主体年代虽然已经晚到唐代中后期，但当中仍然保存有不少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因素。一方面，可以观察到这些墓葬中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如都兰热水2018年一号大墓中出土有典型的北朝时期的青瓷莲花四系罐、北朝至唐代的丝绸残片，乌兰泉沟一号墓壁画中出现中原式样的木结构建筑式样和农牧并举的生活场景，壁画中的人物服饰既有着吐蕃装的牵马人，也有着鲜卑装的吐谷浑人，反映出多民族融合的历史画面。另一方面，这些墓葬中又出土有大量具有欧亚草原文化特色的金银器、珠饰等物，有些金银器同时具有波斯萨珊、中亚粟特和东方唐王朝的艺术风格，以往在西宁也曾发现过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sup>④</sup>这些考古实物都充分反映出历史上吐谷浑与各古代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因此，梁元帝《职贡图》中将河南国（吐谷浑）使者的地位加以强调了，也是和河南国在与南朝交往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

## 四、结 论

综上所述，透过梁元帝《职贡图》所留给后世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我们可以观察到多侧面的历史情景，也使其具有了重要的史料价值。

首先，是在南北朝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南朝的“天下”和“国家”观仍然保持了秦汉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史观，对于“中国”的认知仍是以南朝作为中原王朝的正朔所在，维系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观念。同时，又以秦汉以来的“朝贡”制度为主要手段，通过对域外或边疆古代民族首领和使节的接待礼仪和列位方式，来体现“天下秩序”或“藩臣之礼”。即使是在北朝强敌形成严重压力的局势之下，南梁政权仍然以帝王之尊或亲自接待这些来自“四夷”的使节，或通过“瞻其容貌，诉其风俗”，绘制成《职贡图》，尽可能收集各方资料信息，力图维持其大一统的中心地位。这一点王素先生曾有过很好的总结：“它反映了作为当时世界主体或中心的梁朝，对作为附从或外围的各国的分野及秩序的看法。”<sup>⑤</sup>

①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951—952页。

②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928页。

③ 霍巍：《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

④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⑤ 王素：《梁元帝〈职贡图〉与西域诸国——从新出清张庚摹本〈诸蕃职贡图卷〉引出的话题》，《文物》2020年第2期。

其次,为了维系这个“世界主体”或“中心”的地位,就必须保持中西交通,尤其是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但在地理区位上,政治中心位于长江下游的南朝与北朝相比,明显处于劣势,与西域之间远隔万里长江水道,所以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巩固其对长江上游和中游的控制,才能保持与西域各国的畅通。从本文所揭示的有关历史情况来看,这应是梁代在当时与北朝、西域多边关系之下采取的内部治理与战略重心调整的重要举措之一。因此,梁元帝在《职贡图》序言当中所表现出的对于长江上游的特别关注,应有其战略深意。

复次,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在梁元帝《职贡图》中,将长江上游、甘青地区的部分“西戎”以及长江中游一带荆楚的部分“诸蛮”,也都列入与海南、东夷、西北诸戎中的西域诸国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对待,这并非只是单纯地为了夸耀其治国“政绩”,而另有更深层面的实际运作和外交上的彰显效果在内。其目的,是旨在通过对川西北高原、甘青一带“西戎”和长江中游“诸蛮”之间的掌控、交往和互动,建立起以长江上游益州、中游荆州为重镇的战略交通网络,以服务于南朝总体性的国家策略。

从实际运作效果上看,这一策略应当说是相当成功的。对于南北朝时期这条从长江下游建康先抵益州,然后过河南国通往西域的这条历史上被称为“青海道”“河南道”“羌中道”的交通路线,前贤已经多有论述,兹不赘述。只需要补充一条重要的考古证据: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曾有两件文书上都提到了“吴客”,荣新江先生考证认为这些所谓的“吴客”,实际上就是来自南朝的使节,早在南朝刘宋时期,他们就已经先抵高昌,再去柔然(芮芮)。<sup>①</sup>南梁时期与西域交通仍然保持了畅通,前引梁裴子野所记“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就是一个明证。

透过对梁元帝《职贡图》的进一步研究,除了对其本身历史价值的探讨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实意义,即在以汉文明为中心的王朝历史书写当中,一方面固然具有传统的“天下想象”和“华夷认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传统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不断融入更具时代特征和富有实际政治运作意义的新元素。本文所论的梁元帝《职贡图》中所反映出的对长江上游川西北高原和甘青地区“西戎”诸国、长江中游荆楚“诸蛮”的重新归类与定位,事实上也是南朝加强远离南朝政治中心的西南、西北边地各古代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重整南朝内部政治地理结构、建立新型“华夷”关系的重要国策之一。这一举措也为后来隋唐统一国家建立过程中,重塑中央与边疆各族群以“朝贡体制”为核心的内在联系与等级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唐会要》卷63《史馆上》记载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其中“蕃国朝贡”条下云:“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sup>②</sup>笔者认为,这一制度的历史渊源或可上溯到梁元帝《职贡图》,体现出唐王朝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继承与发展前朝遗策,重整统一思想文化体系,通过“朝贡体制”多方吸取信息资源,强化国家治理的国家观和民族观。认真梳理和研究历史上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对于今天我们从历史脉络上深入探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命题,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责任编辑 贾益〕

<sup>①</sup> 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收入其论文集《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9—50页。

<sup>②</sup> 《唐会要》卷63《史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5页。按:此条史料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钱云副教授见示,特此致谢!